

关于瞿秋白与俄苏文学关系的几点思考

[作者] 陈春生

[单位] 湖北师范学院中国语言文学系

[摘要] 本文认为瞿秋白与俄苏文学的关系一直只隐性地存在于瞿秋白研究中,但缺乏专门比较研究。瞿秋白接受俄苏文学的路径与同时代作家不同,因精通俄语他能直接进入俄苏文学的核心,但也使他接受视野受到制约,而且由于传统知识结构的影响,瞿秋白接受俄罗斯文学的过程中表现出人格上互为矛盾的指向。

[关键词] 瞿秋白, 俄罗斯文学, 影响

作为一种重要的精神资源,俄苏文学一直隐性或显性地影响着 20 世纪中国文学。中俄文学之间的亲密关系,构成了 20 世纪中外文学交流史上一个独特的现象。留下了许多具有研究价值的个案。瞿秋白是值得研究者重视的代表性个案之一,因为无论置身“走俄国人的路”的五四时期;还是身处“红色 30 年代”的中国左翼文学运动时期,瞿秋白都是文学变革的积极参与者和领头人。他对俄苏文学的翻译、他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文艺理论的介绍、他运用新的批评模式进行的文学批评和他的不太多的文学创作,不仅对中国新文学在特定时代的蜕变和转型,起到了引路作用,而且记录了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审美心理需求的变化和新的文学价值观的确立过程。

本文是研究瞿秋白与俄罗斯文学的关系系列论文之一,论者试图把瞿秋白与俄罗斯文学的关系作为一个完整的系统进行宏观考察,认为瞿秋白与俄苏文学的关系一直只隐性地存在于瞿秋白研究中,但缺乏专门比较研究。瞿秋白与俄苏文学的关系既简单又复杂,瞿秋白接受俄苏文学的路径与同时代作家不同,因精通俄语他能直接进入俄苏文学的核心,但也使他接受视野受到制约,由于传统知识结构的影响,瞿秋白接受俄罗斯文学的过程中表现出人格上互为矛盾的指向。

—

长期以来,由于瞿秋白在中国革命史上扮演的多重角色,人们更关注他作为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的历史地位和功绩,并从党史的角度研究他的文化活动。这种政治性解读,使得人们忽略了对瞿秋白与俄罗斯文学关系的深入考察,但我们从前辈的研究中,可以感受到对这一课题研究的隐性存在。

为了叙述方便,我们将关涉到瞿秋白与俄罗斯文学关系的有关论述以 1949 年为界,作一个简单的回顾。

1949 年以前,主要是对瞿秋白研究资料的搜集整理,这其中,已有相当的材料涉及到本论题。1935 年 4 月 24 日,瞿秋白被敌人逮捕,6 月 18 日在福建长汀被杀害,瞿被俘后,最早得到消息的是鲁迅,凭着敏锐的政治感觉和对瞿秋白人格的了解,鲁迅知道瞿秋白可能被杀,5 月 22 日,在给曹靖华信中说:“它(指瞿秋白—笔者注)事极确,上月弟曾得确信,然何能为,这在文化上的损失,真是无可比喻。”很显然,鲁迅看到瞿秋白在马克思文艺理论翻译介绍方面的巨大成就,为此感到痛心,“中国人现在自己把好人杀完,秋即其一,——中文俄文都好,像他那样的,我看中国现在少有。”为了纪念瞿秋白,鲁迅 6 月下旬开始同友人酝酿出版瞿秋白的译文遗稿,9 月将收集的译文稿定名为《海上述林》,9 月 1 日,在谈到《死魂灵》翻译时,鲁迅再次表达了对这位才华横溢的战友的怀念和对杀人者的痛恨。

“瞿若不死，译这种书是极相宜的，即此一端，即足判杀人者为罪大恶极。”左联机关刊物《文艺群众》创刊号上，也对瞿秋白遇害作了评价，“他的名字将是中华民族万古不灭的光辉，将是中国左翼文化中烛照长空的火焰，临刑之前，听说他站在长汀破晓的天野，唱着俄文《国际歌》，在生命最后一刹那，他一点也没有忘记世界革命，没有忘记全世界无产阶级的祖国。”这一评价，使我们看到那个时代进步的人们对苏联的深厚感情和中国革命在精神上与苏联的血缘关系。自然在那样的环境中，瞿秋白与“世界无产阶级祖国”——苏联的割舍不断的关系得到了特别的强调。应该说，1935年瞿秋白被害后，左联机关刊物上的文章和鲁迅编辑的《海上述林》对瞿秋白与俄苏文学关系的研究具有奠基意义，它代表了研究者评价瞿秋白在20世纪中国历史地位的两个不同方向，即政治评价和文学评价，这种评价几乎都不约而同地涉及到俄国文化和文学作为精神资源对瞿秋白的重要意义。从学理意义上说，鲁迅搜集整理瞿秋白的遗稿，为我们研究瞿秋白与俄苏文学的关系保留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说鲁迅是研究瞿秋白与俄苏文学关系第一人并不为过。而左联的评价从政治层面给我们的研究给予了支持。

有趣的是，1936年，法国《巴黎时报》也刊有介绍纪念瞿秋白的文章数篇，其中《瞿秋白先生略传》尤值关注，作者以精要的语言，介绍了瞿秋白在苏维埃俄罗斯的活动，以及俄罗斯革命对他思想的深刻影响，作者认为，在人们普遍不了解俄罗斯革命甚至在资产阶级肆意歪曲十月革命的时候，瞿秋白“独能一一秉公正的事实求是的记者精神，综情实，剖抉原委”，瞿秋白本人也在考察中，“日益懂得俄国，懂得布尔什维克党”，因为“对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有机会目击和亲炙，他的革命意志益加坚决，不久以后遂正式加入共产党。他的带有光芒的政治生活遂自此开始。”这里作者注意到瞿秋白人生路上，俄罗斯所给予的重要影响，开始涉及瞿秋白世界观的确立和精神人格养成与俄罗斯精神资源之间的不可分割的关系。显示了一种全新的视角。1936年10月，鲁迅抱病为《海上述林》撰写出版消息，从一个研究者的角度对瞿秋白翻译介绍的所有苏俄文学作品的艺术成就作了肯切的评价：“本卷所收，都是文艺论文，作者既系大家，译者又是名手，信而且达，并世无两。其中《写实主义文学论》与《高尔基论文选集》两种，尤为煌煌巨制。此外论说，亦无一不佳，足以益人，足以传世。”鲁迅所称道的《写实主义文学论》，就是指编入书中的《“现实”——科学的文艺论文集》，这是左翼文学急需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指导的时候，瞿秋白及时将正确的文艺理论介绍到中国文坛，在当时是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文艺论著的相当系统的介绍。鲁迅在去世前4天，还对瞿的译文非常称道：“《现实》中的论文——原属‘难懂’这一类的，但译这类文章，能如史铁儿（瞿秋白笔名——引者注）之清楚者，中国尚无第二人，单是为此，就觉得他死得可惜。”1938年5月5日，上海霞社出版了瞿秋白的《乱弹及其他》内中收有瞿秋白1932夏年至1933年春避居上海紫霞路68号谢澹如家所创作的杂文、诗、小说、文学论文和译文共50篇。这对研究瞿秋白30年代与俄苏文学的关系提供了很重要的资料保证，特别是其中的译文可以看出瞿秋白选择翻译的视角和心理的变化，6月9日至10日，《文汇报》连载了钱杏村《关于瞿秋白的文学遗著》一文，该文介绍了瞿秋白文学遗著的丰富性。1939年，具有学者眼光的钱杏村准备在上海孤岛出版包括政论在内的瞿秋白的全部遗著，他特别谈到瞿秋白的著作对进步文化思想界的巨大影响：“瞿先生从事政治文化运动，前后凡20年，所作文字，不下六、七百万言，在政治文化上所取之影响极大，此伟大之历史里程碑，时至今日，实不能再听其湮没。”阿英特别注意搜集瞿秋白与俄苏文学关系紧密创作，“诸凡瞿先生初期著作，苏联通讯，文学译品，以至发表在秘密刊物上之有关文艺文字，靡不搜罗具备。”，这是继鲁迅以后，又一次大规模搜集整理瞿秋白著作的行动，而且对瞿秋白的文学成就进行了评价，特别提到那些展示瞿秋白在苏联发表的通讯以及后来的译文。循着这条思路，同年9月，李何林编《近二十年中国文艺思潮论》，对瞿秋白在现代文学思想史上的地位，从文学的视角进行了中肯的分析和评价，他指出“在近20年中国文艺界中，除

鲁迅外，瞿秋白也站着很重要的地位”。作者分析了瞿秋白的《赤都心史》等一批创作，“可以看见它的风格底清新、俊逸，漂亮，通俗，深刻，锐利，而且有力！”李还分析了瞿秋白取得文学成就的原因，“这当然不仅仅由于他的文字的形式，而是由于他的博大精深的哲学，社会科学和文学知识，而是由于他的社会文化斗争的实践。他在现代中国的文化批评，社会批评和文艺批评上，和鲁迅站着同等重要的地位。他的作风虽有一部分和鲁迅不同，但他二人的学识，思想，文章，在现代的中国实在可称为‘双壁’！”这种评价已接近真实的瞿秋白，但作者没有探讨瞿秋白思想的来源，为我们留下了理论思考的空间。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后，讲稿“放了半年才拿出来。这半年之中，主席阅读了《海上述林》等等”。1945年，中国共产党第6届7中全会上，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从政治上肯定了瞿秋白的伟大历史功绩并对30年代领导左翼文学运动的工作进行了肯定。

1947年，冯乃超编选了瞿秋白的《鲁迅杂感选集 序言》和论文大众化论文6篇，题为《论中国文学革命》，在后记中，冯乃超注意到瞿秋白将马克思主义的文学理论和中国的具体情况相结合，指导中国左翼文学运动的功绩。“他的文艺批评文字纠正了当时不少作家及文艺理论工作者的错误倾向。他对中国的新文学运动，留下了很宝贵的意见。他又是最先用马列主义方法来处理中国文艺问题的人。”冯乃超已经涉及到瞿秋白30年代的文学批评理论资源的源头。还注意到瞿秋白接受外来异质文学观念过程中对原有理论来源的创造性改造。

应该说，1949年以前对瞿秋白与俄苏文学的关系研究还只是隐性的存在零星介绍中，而且很不系统，更谈不上真正具有学理意义的研究。但我们仍能看到这一时期研究的某些特点。

首先，由于瞿秋白命运的丰富性和曲折性，49年以前涉及到瞿秋白与俄苏文学关系文字，基本上政治评价的延续，而瞿秋白精神人格的养成与苏联的影响分不开。作为共产党幼年时期的杰出领袖，他的死，极为壮烈，他是在为一种崇高的信念而献身的，他是旧制度的不妥协的战斗者和新的理想社会的歌者，他的全部活动和价值追求，代表着一代先进中国人的价值指向和追求，在血雨腥风的年代，他成了精神典范，因此，无论是还处在为中华民族前途苦斗的政治家还是为中国人民寻找新的文学范式的进步作家，最关注的是瞿秋白崇高的精神人格。这种高尚精神人格的内在精神源泉显然与他在苏联接受先进的教育密切相关，我们从政治性解读中，能感受到这种关系的存在。

其次，就研究主体而言，1949年以前的研究者多为瞿秋白的同时代人，尽管还没有有意识的集结研究的队伍，但在搜集整理材料的过程中，有许多与瞿秋白的材料相伴生的一些资料如回忆录、文稿的后记等等，为我们进行瞿秋白与俄苏文学关系显性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由于他们是近距离的观照瞿秋白，因而资料的权威性不容置疑，这一领域的拓荒者应该不能忘记鲁迅、茅盾、冯雪峰、阿英、冯乃超等瞿秋白的战友和文学上的挚友。

其三，作为生活在20世纪中国历史最为动荡复杂时代的人，无论是瞿秋白本人还是瞿秋白的研究者，他们受时代的制约，或者说是时代造就了他们的美学观，现实的适用性原则成了研究的推动力之一。这一批人关注俄罗斯革命经验，渴望盗取天火，来照亮民族解放的道路，在这种背景下，无论是马列主义文学理论还是俄罗斯文学，只要“照暗夜”即可，这种心态很难让他们展开深层次的思索。但是作为拓荒时期研究成果，它较鲜明地揭示了瞿秋白与俄苏文学发生关系的过程，而且还保留了许多鲜活的材料。

1949年以后，一直到1979年，瞿秋白与俄苏文学关系的研究并没有突破性进展，主要原因是作为政治家的瞿秋白和作为文学家的瞿秋白两重角色的不协调。当然，我们仍能见到一些关涉到瞿秋白与俄苏文学的材料。1951年，曹靖华回忆瞿秋白在苏俄带病写作的情况，还介绍了瞿秋白翻译《国际歌》的情况，特别谈到瞿秋白介绍俄苏文学的动机，“应当把介绍苏联文艺作品与文艺理论工作当作庄严的革命政治任务来完成。”这一年瞿秋白的活动年

表也出现了,尽管有脱漏,但其中有关著译篇目,对本课题研究仍有参考价值。1953年,《瞿秋白文集》出版,在文集序言中,对瞿秋白进行了全面具体的评价,可以看成是瞿秋白研究的一个结论性的成果。文集序言在首先确立瞿秋白作为一个革命家的身份,然后指出:

“但同时又是一个著名的有天才的革命作家、批评家和文学翻译家,虽然他不曾有更多的时间从事文学活动,但他所留下来的文学著译,不仅分量仍然不少,而且无疑是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宝贵财产。”“这些作品,不管是创作、批评、研究,以至于介绍和翻译,都尖锐地反映着时代意义,都具有明确的社会斗争的目的。它们的一个很突出的根本性特色,就是贯穿着一种革命民主主义思想和共产主义的启蒙精神,贯穿着对于社会的一种现实主义的、彻底的态度。这一特色使我们看见,对于一个革命者,无论在哪一种形式和在什么机会之下,文学都是战斗的工具,用它来批判社会、打击人民的敌人,也用它来启发与教育人民、鼓舞人民的斗争;同时也使我们了解,这种特色正是“五四”文化革命和文学革命的最好的传统精神。”

这篇序言是冯雪峰的手笔,作为瞿秋白后期生活的直接见证人和朋友,以及具有共同的文学追求的战友,他从思想层面概括了瞿秋白作品的精神内涵和瞿秋白从事文艺活动的动机,应该说是非常中肯的,特别是冯雪峰注意到瞿秋白与俄罗斯10月革命内在精神联系,他指出:“当他受了伟大的十月革命影响之后,他是中国最早宣传共产主义的思想先驱之一。”而且认为瞿秋白是五四文化革命和文学革命的传统精神的代表者。1959年1月,丁景唐、文操编辑的《瞿秋白著译系年目录》出版,为瞿秋白研究作了一件卓有成效的工作。但在以后相当长的时间内,瞿秋白研究工作陷入停顿,特别是文革中,在单一的极左政治思维的支配下,瞿秋白被污为叛徒,坟墓被毁。这种状况,到1979年以后才出现新的转机,但文革所遗留的后遗症仍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存在,研究者不得不费很长时间进行辩诬工作。当然研究工作一旦步入正轨,就会出现质的飞跃。这里特别值得提出的是,从1984年开始,由人民出版社和人民文学出版社陆续联袂推出《瞿秋白文集》14卷本,其中政治理论编8卷,文学编6卷,这是目前收集瞿秋白著作最全面的文集,为以后瞿秋白研究工作提供了权威性文本,也就是在文集出版前后,在瞿秋白研究中,出现了一系列关乎本论题的研究成果。今择其要者,加以罗列。如《瞿秋白论稿》(王铁仙著)、《瞿秋白年谱》(周永祥)、《瞿秋白年谱长编》(姚守中等)、《瞿秋白思想研究》(丁守和)、《中国左翼文学思潮探源》(艾晓明)、《瞿秋白评传》(陈铁健)、《瞿秋白传》(王观泉)、《文人瞿秋白》(韩斌生)、《总想为大家辟一条光明的路》(朱钧侃等编)、《瞿秋白与他同时代人》(孙淑编)、《瞿秋白研究》(瞿秋白纪念馆编)。这些论著从不同的侧面涉及到瞿秋白与俄苏文学的关系。这里特别要提到的是《中国左翼文学思潮探源》一书,作者从中国左翼文学思潮发生史的角度对瞿秋白与拉普之间的思想联系进行了认真的研究,资料翔实,论证充分,是笔者最近几年见到的最为有分量的论著,但从瞿秋白与俄罗斯文学关系的研究视角看,由于选题的侧重点不同,她只考察了30年代瞿秋白文学理论的资源。而没有就瞿秋白与俄罗斯文学的关系进行整体性研究。目前有论文关注这一课题。也有些专著部分涉及到瞿秋白与俄罗斯文学关系的,如《普希金与中国》中介绍了瞿秋白对普希金的翻译介绍情况。

1949年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对瞿秋白与俄苏文学关系的研究较之于解放前更具有系统性和学术化研究,但是考察瞿秋白与俄苏文学关系的论文非常少。究其原因,可能是:首先,相对于瞿秋白在革命实践领域的贡献,关于他的精神资源来源问题研究,显然不具备中心话题的地位。瞿秋白尽管在文学史上有很高的地位,但他不是纯粹的文学家,研究这种关系,我们很难将他与政治家、思想家的身份区别开来。其次,研究瞿秋白与俄罗斯文学关系,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不仅涉及其翻译及创作,还涉及到他的杂感、散文,以及通讯报道,甚至还有他驳杂的政治论文、社会学著作。而在1984年以前,《瞿秋白文集》没有出版的情况下,我们很难把瞿秋白杂多的创作在文学的视界中整合起来。而且瞿秋白与鲁

迅等现代文坛上的大家接受俄苏文学不同，考察鲁迅与俄苏文学的关系，我们能从具体的文本研究中，找到影响的痕迹，而瞿秋白的创作相对于他的翻译和文论，分量要少些，而且很难进行硬性的比附研究，因此影响比较研究就会缺乏必要的文本支撑，其三，30年代革命文学是一股世界性的文学思潮，而这股思潮的发源地在苏联，无产阶级发展自己的文学的特殊组织方式，体现了很强的组织力，形成了以苏联为核心向世界辐射的格局，在革命化语境下，中国30年代左翼文学精神资源无论是直接还是间接，均来自苏联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作为一种强势文学，中国的接受者缺乏主体精神，许多观念基本上是横向移植，因而很难进行深入仔细的辨析。而无产阶级文学诞生的基本背景和无产阶级对文学的具体要求，一般来说，尽管各国面临的任务不同，在进入实践阶段呈现的形态不一样，但是文学的本质是没有变化的，所以能够进行言说的空间不是很大。

但是这个论题仍然具有研究价值，从接受影响模式看，接受者对信息源的接受和拓展，已经包含了特定时代的文化内涵，我们通过瞿秋白选择什么而抛弃什么，可以看到多种文化因素对人接受外来异质文化的合力作用，它促成了一个从旧的知识氛围中走出来的人的世界观的形成。从接受的文学资源中建立了一种新的文学批评的方法。

二

瞿秋白与俄苏文学关系，既简单明晰又复杂多变。说简单明晰，在他短暂的一生中，他从事文学翻译、文学批评和文学创作的时间相对比较集中。而且俄罗斯文化和文学成了他文学活动的全部的异质文化资源。他的文学活动主要在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1919年到1924年期间，在五四运动的激流中，经受社会转型中诸种思潮洗礼的瞿秋白，对俄罗斯文学情有独钟，他翻译了一些俄罗斯小说，并在列夫·托尔斯泰的思想面前作过短暂的停留，但社会的剧变，使他更关注俄罗斯的社会现状，1920年12月，抱着“总想为大家辟一条光明的路”的宏愿，在人们普遍心仪苏俄、却又不了解苏俄的时候，瞿秋白亲赴俄罗斯，经历了俄罗斯社会变革的最关键时刻，深切体验了“共产主义人间化”实验的艰难，一方面，他以一个中国年轻记者的身份，如实地展示了社会蜕变时期的无序状态下社会政治的混乱和人们生活的困顿，另一方面，他又感受到了诞生于血与火的新社会里，人们身上所蕴涵的生命的激情和巨大的创造力。尽管遭受了许多困苦，但瞿秋白没有退缩，相反从困顿的现实中，看到了“共产主义人间化”的光辉未来，并在“赤都”完成了自己思想观念的转变，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由一名追求民主、科学的热血青年成长为一名共产主义战士。从此瞿秋白把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作为自己的终生追求。

因此这个时期，瞿秋白翻译接受俄罗斯文学与现实社会生活的变化发生了紧密的联系，也显露了一个年轻人由不成熟走向成熟过程中多变而骚动的心，瞿秋白的翻译记录了他心灵深处的某些变化过程：在五四运动的初始阶段，瞿秋白还没有完全意识到文学与现实社会的关系，他对俄罗斯文学的选择与翻译，还保留着相对封闭状态下的经院学派的个性化审美趣味，古典俄罗斯文学作家和作品成了他关注的对象，而且翻译语言还带有初学者的稚嫩。但随着俄罗斯十月革命对中国影响的深入，以及中国知识分子对俄罗斯文学关注度的加强，瞿秋白审视俄罗斯文学的视点开始发生变化，1923年8月，从苏联回国后的瞿秋白发表了《灰色马与俄国社会运动》，这篇文章的思路，可以看作是瞿秋白思想观念转变后，对俄罗斯文学所展现的全新视界，瞿秋白把文学和变革社会联系起来，同时把它作为自己文学批评的出发点，他随后撰写的《劳农俄国的新作家》，则是他文学审美观念发生变化的一个延续，这种变化又与他的创作构成了一种互动关系，形成了相互印证的系统。这一时期，瞿秋白创作的散文、诗歌、随想录等体裁多样的作品，其文化内涵迥异于五四时期其他作家，特别是对《国际歌》的翻译和《赤潮曲》的创作，预示了新的文学品格的长成，也预示了五四新文

学转向后的某些新的因子，这些创作文本所展示的独到的审美视野和审美趣味，可以看出新俄文学对瞿秋白的灌注，从文学史的角度看，它实际上是 30 年代左翼文学的滥觞。

瞿秋白与俄苏文学关系紧密的第二个时期是 1931 年至 1934 年，从苏联回国不久，瞿秋白即投身具体的革命实践活动，由于他出色的政治才华，他很快便成为党的领袖，社会角色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现实的政治问题需要他作出认真的思考，他再也很少顾及文学了。所撰写的一些文艺性论文，基本上是前一时期的延续，只不过文章的阶级意识、现实针对性较之于前期更为明显。直到 1931 年，他被排挤出中国共产党领导层，重新回到文学战线，才开始了他眷恋的文学创作和翻译，但是，此时的瞿秋白和五四时期相比，无论是学养还是人生经历都要丰富得多，当他所承担的社会角色开始向初始所热衷的文学家的角色转换时，作为政治家的角色职能依然影响着他的思考方式，更何况这种角色的转换，是以一种非正常的程序和外力挤压来实现的。因此，这个时期，是瞿秋白多重性格表现得最为全面具体的时期，一方面，他在积累了丰富的社会经验之后，对无产阶级文学的阶级性质、无产阶级文学的目的和服务对象甚至包括无产阶级文学的言说方式都进行了具体的探究，他试图在苏联社会主义文学理论的框架之内，建构中国的革命文学理论的分部，同时，面对新型文学的弊端，他又在理论建构的同时，力图在苏联文学中寻找中国新文学的样本，于是瞿秋白把普希金和高尔基作为自己的传播对象，瞿秋白选择翻译和介绍的对象，所蕴涵的文化意义值得我们探询，因为在人们普遍将苏联的理论奉为金科玉律，否定五四以来极为脆弱的现实主义文学传统时，瞿秋白却通过这种方式强调了文学传统对革命文学指导意义，很显然，瞿秋白对这些俄罗斯作家的推崇，不仅仅是他们的作品深邃的题旨以及政治性意义，而是承载这些题旨的内在建构，即文学自身的魅力。这说明，作为一个实用的工具主义者，瞿秋白更注重工具本身的独特性。在极左观念盛行的时候，瞿秋白的选择翻译的指向性，显示一个真正深谙文学规律的理论家的气度和眼光，同时也显示了他的理论创新的勇气。

30 年代，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中国广泛传播并被运用于文学实践的时代，而瞿秋白对马列主义文学理论翻译介绍的系统性和准确性是别人无法企及的。他的一系列批评活动，又是将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来解决中国文学中现实问题的实践，这对于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中国化，对于中国工农兵文学思潮的形成，无疑具有先锋性作用，那么，在这一时期，瞿秋白翻译介绍俄苏文学理论的过程中，在多大程度上进行了选择性的取舍呢？在他的文学批评过程中，他从精神资源接受中进行了多少创造性转换呢？在革命性的文艺理论中，瞿秋白在苏联文学理论和毛泽东之间到底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呢？对这些问题的预设，将是研究瞿秋白在 30 年代革命文学与俄罗斯文学相互关系的重要切入角。

但是，作为接受主体，瞿秋白在应对丰富的俄苏文学时，他的心灵世界又是复杂多变的，这种复杂性体现在作为一个深受中国古典文化传统影响的知识分子，一个敏感而审察的个体，在普遍强调将人从社会、传统的桎梏中解放出来的时候，他却更多地从自我心灵的审察中来观照社会对人的压迫，把自我作为具有普泛意义的“人”标本加以分析，因此，他的创作，多为“心史”、“心的声音”，着重表现个人与社会、个人与自我的冲撞中人心灵无所皈依的焦虑感，这种关注视点流露出非常强烈的传统“士”的气质。从政治层面上说，瞿秋白总是徜徉在“出世”和“入世”之间，许多时候，他总是渴望进入到超然物外的境地。一个典型的例子是，瞿秋白在进入俄文专修学校不久，俄国发生了 10 月革命，瞿秋白大量阅读进步书刊，接触新思想，并思考人生的终极意义等问题，应该说他的人生态度是积极的，但即便是置身于民族启蒙的前沿，他依然保留着一股浓烈的士大夫气，对“出世”保留着一股欣欣向往之情。在给朋友的一幅山水画上，他题词：“松风自度曲，我琴不需弹，胸中具此潇洒，腕下自有出尘之概，何必苦索解人耶？”瞿秋白称自己是一个“脆弱的二元人物”，应该说这种分析是切合实际的，瞿秋白的精神人格在许多时候处在分离状态，多重性格不仅决定了他对政治生活的诸多“不适”，而且也使他他对俄苏文学的接受始终处在两个互不相容

的层面上,表层面上,他的接受是为了现实的需要,这种需要是以阶级、集团的要求为主旨,拒绝个性体察,在这种接受动机的驱策下,瞿秋白选择的接受对象往往是一种平面化的、缺乏个性的。但是深层次上,中国传统的士大夫气质,左右着他的接受,他在精神气韵上,更喜欢俄罗斯文学中关注自我体验、关注心灵皈依等特有的作品。我们以为,中国传统的士大夫的忧郁气质与俄罗斯人的忧郁情绪在瞿秋白身上许多时候是相互感应的,因此,俄罗斯文学中“多余人”成了瞿秋白解读梦醒后无路可走的新的言说方式,在阅读瞿秋白早年的作品和他的生命绝唱《多余的话》时,我们时时感受到俄罗斯文学对他的言说方式和思考方式的影响。在许多时候,瞿秋白借用俄罗斯文学中的典故,来表述自己的愁绪,在主导面上,他具有积极入世的思想 and 行为,但与这种积极“入世”相伴生的是他的逃遁意识。当他在即将走向生命终结的前夕,这分裂的人格表现得非常明显,一方面为革命的前途担忧,表现了一个革命者忧国忧民的情怀,但同时,他又为能彻底逃遁尘世而有一种解脱后的快意。正是后一种情绪,常常受到政治性解读者的排斥,但这显示了瞿秋白精神人格的一致性和丰富性来。而过去,我们虽然注意到瞿秋白性格的矛盾,却没有探讨这种矛盾产生的根源,因而一些论述显得简单化,给人一种隔靴搔痒的感觉。

三

通过上面的梳理可以看出,瞿秋白参与中国新文学活动的这两个时段,恰恰是 20 世纪中国文学发生现代性蜕变两个非常关键时期。五四时期是 20 世纪中国文学由近代向现代转型时期,而 30 年代,则是中国新文学向着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转变的时期。在这两次文学转型中,俄苏文学作为最为重要的外在催化力,始终对中国文学发生着重要的影响,而作为这一影响的传递和扭结,瞿秋白的中介作用,所具有的重要性是不言自明的。

从瞿秋白与俄罗斯文学的影响接受关系中,有几点值得我们注意:

一、瞿秋白接受俄苏文学的方式和途径与鲁迅、茅盾、郁达夫等同时代作家有所不同,鲁迅、茅盾、郁达夫等作家是在亲身感受了西欧文学观念、并经过反复的对比、思考以后,才在俄苏文学中找到了自己需要的精神养料,而且他们接受俄罗斯文学往往是通过英语、德语和日语来实现的,这种接受方式的间接性,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语言转换问题,它实际上隐含了异质文化对接受者选择视野的制约,中间媒质的过滤和阻隔,使得这几位文学巨匠必须在别人选择的范围内寻找自己的所需。但同时,又因他们所掌握的外语语种在现代社会交往中具有普泛性特点,在一个日益开放的社会空间中,他们能够更便利地借助英、德、日等诸语种审视不同民族的文学,从而在更广阔的背景上,选择那些对自己能产生亲和性的文本加以接受。而瞿秋白是个例外,由于人生遭际的诸多曲折,他虽然懂英语,但并没有在这门语言上施展自己的才华,而是出于谋生的考虑,放弃了已经有一定基础的英语而转向学习当时视为冷门的俄语,并在高等专门学校中接受了俄罗斯语言系统而严格训练。年轻的瞿秋白在正规的训练过程中,储备了相当丰富的俄罗斯古老文化传统和文化背景知识,这样他可以凭借着语言的优势,直接进入俄罗斯文学的核心。

其二、瞿秋白接受外来异质文学的独到经历,给了他接受俄苏文学的便利,但我们也应该注意到,他的优势同时又构成了他接受西方文学的不足:在五四这样一个空前开放的时代,他摄取外来异质文化的视域,没有其他人宽阔,各种社会思潮刺激的强度对瞿秋白来说,也没有俄罗斯文化来得强烈。瞿秋白一辈子对俄罗斯文学是那样执着,而且这种执着直到死时也没有改变。这种接受方式,一方面表明俄罗斯文学对瞿秋白影响的深刻性和瞿秋白对俄罗斯文学的坚定和执着,但从另一方面也说明,在开放的背景下,瞿秋白接受外来文化的影响相对单纯些,或者说,显得略微封闭了些。因此瞿秋白与俄罗斯文学的紧密关系,既显示了外来文化的积极影响,也展示了它的不足,特别是外来异质文学中的某些消极因素与瞿秋白

接受的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消极要素相结合时，对瞿秋白的人生态度产生了复杂的影响，也对他的文学观念和审美趣味产生影响，当鲁迅、茅盾、郁达夫等作家通过多元的异质文化的自我调节功能对某些消极因素进行过滤时，瞿秋白所接受的单一的外来文化却缺乏这种功能。因为在他的知识结构中，中——俄文学单一对应文化因子，扭结在一起，两者之间思维模式的同一性被现实强化了，不象鲁迅他们知识结构中充满了丰富和杂多。可以说，俄罗斯文化和文学的积极面和消极面都镌刻在瞿秋白短暂的人生中，和他的生命相始终。

其三、尽管由于时代的变迁和社会心理的变异，具体的历史语境不同，瞿秋白接受俄罗斯文学的切入点和接受层面在两个时代表现出明显的不同，但从本质上说，指导瞿秋白翻译介绍的观念并没有根本性变化，即他的翻译介绍主要是以现实社会需要为出发点的。他始终把俄罗斯文学作为中国新文学的范本加以推崇，并通过这种范本所传达的思想来影响中国社会；这决定了他选择接受的强烈的实用性原则。以现实社会的需要为动力，盗起俄罗斯文学的天火，为着建设先进的中国文学和文学理论体系而努力。并用这种理论指导和规约着现实文艺的发展。作为从传统文化中走出来的现代知识分子，他很难同过去分离，因此，他的翻译和介绍中，又不经意地注意到自己的心灵需要。这两者看起来似乎有些矛盾，但恰恰是这种矛盾，折射出 20 世纪一个激进的革命者走向现代的艰难，从中我们还可以管窥瞿秋白精神人格的丰富性和一个接受外来异质文化的知识分子是怎样在与传统文化发生碰撞时的困惑和悲伤。过去人们更多地关注瞿秋白对中国新文学的建设的功绩，缺乏对瞿秋白理论资源源头的追寻，也由于缺乏对瞿秋白思想资源和文学资源的追寻，直接导致对瞿秋白缺点和错误的分析的失据，如果我们把俄苏文学的影响看成是一个巨大的话语系统，以此为背景，考察瞿秋白接受了什么，又扬弃了什么，也许我们对瞿秋白的文学贡献和对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中国化会有更深刻认识。

http://www.chl.hbnu.edu.cn/xszl/detail.asp?n_id=340